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庆致词（代序言）

杨 圣 敏

尊敬的武精华先生、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各位校友和同学们：

今天 我们这里高朋满座 少长咸集 大家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建立十周年，民族学系建立二十周年。在这个喜庆的时刻，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全体师生，向牺牲自己的假日休息，前来参加我们庆祝会的各位来宾和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特别是要向不远万里，来自海外的朋友们，向来自外地的兄弟单位的朋友和领导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多年来，我们学院的工作一直得到各级领导、各兄弟单位，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同行、朋友、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与大力支持 对此 我们一直铭感在心。今天，借此机会，我们再次向各位领导、同行和朋友们多年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中国的民族学界，有骄人的历史、传统和成就。她曾经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专业和民族学系，13所民族院校中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点。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全国高校的民族学专业中综合实力最强的教学与研究单位，在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界也受到普遍的重视，有广泛的联系与影响。

学院有今天的学术地位和成就，得益于大家多年来的支持，特别是得益于永远值得我们骄傲和珍视的众多前辈与优良的传统。

学院的前身是 1952 年中央民族学院初建时即成立的研究部。

几十年前，研究部曾经集中了中国社会学界、人类学界、民族学界、民族史和民族语言学界大部分顶尖级学者。其中有：原清华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原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原燕京大学代校长翁独健；原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时任国家民族委副主任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原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林耀华；原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冯家升；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翦伯赞；原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吴泽霖；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真是星光灿烂，盛况空前。

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人物，在当今中国的学界，都足以被视为一面旗帜，一座学界的高山。而当时这些学界俊彦却全体汇集于二楼的研究部中。不仅如此，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和林耀华还将他们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带到了研究部，其中有陈永龄、施联珠、宋蜀华、吴恒、朱宁、王辅仁、王晓义、陈凤贤、沈家驹等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正是这些人担当了中国民族学舞台上的主角。

研究部还有傅乐焕、马学良、王钟翰、李森、程溯洛、贾敬颜等名重一时的学者。这样的阵容，使研究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民族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

50 年代的民族学院，虽然初创不久，却因为拥有研究部而声名鹊起，迅速成为全国著名的学府之一。二楼楼中所聚集的这批学者，用他们震动全国的几项民族调查和研究成果，赢得了研究部在学术界的地位。他们实际上在短短的几年中间，奠基了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也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特别是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人才。后来中国相继建立的十几所民族学院的第一批教授大部分出于他们的门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部的学者们还奠基和塑造了我们的学术传统和人文环

境。

从 50 年代以后，研究部和以后的民族研究所，一直到今天的民族学系，一直保持着五世同堂、六世同堂的局面。这种人员结构，使得研究部的优良传统得以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就是说，建立一个良好的培育人才的环境，必须几代人持续不断地积累和努力才有可能。这包括资料的积累，知识的积累，特别是科学的学术传统与优良的人文风气的建立与维持。只有建立了这样的一种环境，才可能培育出杰出的人才。我们研究部的第一代前辈，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在学术传统与风气，或者说在育人与育才这两个方面为我们指出了很明确的方向。

这就是吴文藻先生强调的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他还具体地指出了中国化的方式，就是要将社会学的社区研究的方法，与人类学深入观察与访谈的方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民族。而且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们就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在燕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早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确定了民族学在学科中的定位：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中国的民族学专业，就是要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重点是边疆与少数民族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研究部、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系以至今天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才取得了在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界较高的地位，并且受到国际同行的普遍尊重。

我们的另一位老前辈潘光旦先生说：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和造就“人格”。他说大学教育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做人”与“做士”。这虽然是潘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提出的主张，今天看起来，却完全符合现代人文教育的准则。在研究部和此后的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系直至今日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师生中间，老一辈学者们留下的学术研究所依仗的科学民主之精神，独立自由的学术气氛，特别是做学问首先要作人的思想，永远受到推崇。

因此，在喧嚣浮躁的气氛很强烈的时代里，在权利与知识，利益

与事业之间的选择上，我们多数人能够不随波逐流，不赶浪头，将知识和事业，放在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上，并且兢兢业业，刻苦地实践它们。

这样的风气与人文环境，是我们学院的六百多名在校本科生以及学院的博士与硕士研究生能够受到较好教育的最重要保证。

今天，在我们庆祝建院 10 周年与建系 20 周年的时候，追忆前辈学者的功勋与风范，心中不免充满了崇敬与感奋，再次回顾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使我们更加明确今后的方向。

为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而努力奋斗，是我们的崇高职责；继续融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并且努力创建和提升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专业是我们几代人的理想。让我们继承前辈学者的风范与传统，继续追求这样的目标。

最后，让我代表学院师生，再次向前来参加庆祝会的各位来宾与领导，向多年来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校友们、领导们和兄弟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谢谢。

[ 作者简介 ]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在“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经验” 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郝时远

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也代表中国民族学会向这次会议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我到会场后，看到很多熟悉的同行。我觉得这是第一次在北京能召集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一些代表共聚一堂来研讨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经验这样一个主题的会议。主题的选择本身也表明了我们的研究在向更深一步的发展。而这种深化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近 20 年来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它也在指明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国家人类学的研究，在走向国际的同时，它对本土化的重视和本土经验的总结，形成我们国家人类学民族学的特色，乃至提出相关理论框架都会展现出一个美好的前景。虽然我没有能够听到许多学者精彩的演讲和报告，但我从这次会议的结构和阵容来讲，它的确应该是一次盛会。各位与会的代表都会在这次会议上有所收获。大家都清楚，今年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申办下来 2008 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大会的主办权。虽然还有几年的时间，但是我想这次会议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整合我们的思想，整合我们的力量，为四年以后的大会开始作学术上的充分准备。大家都清楚，这次办会的资格是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取得的，来之不易。它不像其他一些国际性的大会如一些大会只是大家鼓鼓掌就通过或是没有太大竞争的会议。这次我们通过充分的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进行竞争性的陈述，最后采取了投票才取得大会资格。我们既要珍惜这次办会的资格，又要在物质方面办好大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样一个学术舞台，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自身的经验和理论推向世界，同时我们也能吸纳来自各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家的理论和经验。所以，此次中央民族大学利用这次庆典活动延伸出来这样一个研讨会和交流会非常好。这为今后几年的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最后，祝各位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及返途一路顺利，心情愉快。谢谢！

# 在“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经验” 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陈 理

今天举行人类学民族学研讨会闭幕式。我有幸在这里谈点体会。

首先，根据我所参加会议的情况，和与一些学者的私下交流，及提供的材料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次会议以院系双庆为切入点，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学术会议。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天的时间开了七个专题研讨会，这些专题会议涉及的内容有和过去的研讨会会有差异的、也有相同的。学术课题本身是会议关注的一个焦点，学科理论建设是会议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此外，这次会议最有特色的是关注到学科发展的研讨。这是很多其他学科不太重视的。把学科本身的发展问题、学术规范问题，它的理论问题，它的方法问题等一系列问题，都统统纳入到学术建设这一范畴来进行研究，充分展示出这次会议的学术性。这真是一次有精致学术品位的会议，这是我想说的它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这次到会的人数 150 人，可以说是由中央民族大学一个学院召开的学术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一次。150 人中，外地学者 60 多人 参会单位 40 多个。人类学民族学不像历史学，也不像理工科的学科，它应该说在中国不是一个很大的学科。但是，却有 40 多

个教学科研单位的参与，老中青学者齐聚一堂，既有如宋先生这样80岁的老学者，也有刚进入这个领域的研究生，而中年在这次会议中显示出强大的实力，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老中青三类学人齐聚一堂，显示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美好前景。没有这一批人，要谈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两点上看，这是一次非常精致的学术会议。

第三，我认为这次学术会议取得了以下的成就。

首先，会议交流了学术成果，共享了治学经验和乐趣。治学是苦的，但苦中有乐。如果你享受不到其中的乐趣的话，治学是枯燥无味的，很难受的。学者们在一起交流，既交流了成果、经验，也交流了乐趣，还探讨了一些前沿的课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次，这次会议强化了学人之间的联系，尤其老中青三代人的联系，这为民族学人类学今后的发展交流及共享研究成果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这是一种有机的联系。这种有机的联系使得今后大家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但是通过学人之间的这种有机交流，能够为共享他们的成果及经验提供更大可能；再次，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为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开辟了很好的课堂。七个模块的学术讲座无疑是开设了一个非常好的课堂，使学生从中领悟到治学的艰辛，也领悟到感受到治学的乐趣，并且使学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科研实习，这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能够得到的一份殊荣，也是难得的体验。他们从老一辈的、中年的、青年的学人之间的这种交流、辩论研讨中体会到什么叫做科研？怎么来做科研？什么叫科研的体制？什么叫学人的品质？以上是我认为这次学术会议取得的三个方面的成就。

因此，我这样说应该不算过分，这次学术会议是2008年民族学人类学国际会议前的一次学术预演，当然这是我的个人妄断，不一定准确。经过多少次预演以后，我想在2008年国际会议上中国学者应该提供出更丰厚的礼物。

最后，祝大会取得辉煌成果，祝各位专家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祝

各位专家在 2003 年至 2008 年中辛勤耕耘，以精致的学术成果参加 2008 年的国际会议，向世界学人展示中国学人的精神与气质。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 “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经验” 研讨会综述

段伟菊

2003年10月8~9日,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建院10周年、民族学系建系20周年为契机,在北京中协宾馆召开了“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经验”研讨会。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法国、加拿大、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湖北、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内蒙古、宁夏、新疆、北京等地大专院校、研究所及国家民委的50多位学者代表近40个学术单位参加会议。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民族学系的全体在校教师和300多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经验”。围绕这一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中国当前现实、民族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问题、汉人社会研究、学科应用的领域及前景、学科中国经验与学科方法论反思、少数民族文化及弱势群体权益保护七个议题进行了发言和热烈讨论。现将七个议题综述如下:

## 一、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中国当前现实

针对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中国当前现实，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民族理论创新的问题。他们认为，与新中国建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国内的民族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差距问题、生态问题和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和文化碰撞日趋明显几个方面。而在当代世界范围内，民族分离主义和各个民族之间的冲突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对于其他学科，中国民族理论建设本身比较滞后。民族理论创新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广泛了解、吸收和借鉴国外以及相近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建立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方向，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方面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的学者对传统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认同理论进行了反思，指出具体的民族同化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背景。而民族认同也是分层次的，还存在“不认同”和“认不同”的现象，有的学者借鉴社会学的“社会公平”概念，提出了“民族公平原则”。有的学者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应该确立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但该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在互相尊重、共同繁荣前提下实现民族团结，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好选择。

## 二、民族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

由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对传统文化形成巨大冲击，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迫在眉睫，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有的学者指出，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前人调查、抢救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从多学科包括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的角度来深入调查和理解民间文化及其变迁形式，并争取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有的学者还从

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提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可分为世界性比较强的文化和民族性比较强的文化。民族性比较强的文化具有保守性、排他性、渐变性和相对性特征，世界性比较强的文化具有可比性、速变性和流动性的特征。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主要保护民族性文化，而对世界性文化则需要大量引进吸收；有的学者对世界和中国范围内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现状进行了回顾，指出我国还缺少从国家到个人的保护机制，在这方面应加强学者的参与意识；有的学者就“黄姚古镇历史文化保护”展示了微观的古镇历史文化田野研究范例及成因分析，突显出古城镇开发保护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必然性；有的学者还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问题、建民族生态村的经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人才培养、民族学者之间及其与政府的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与会者达成共识，认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对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世界上任何民族没有自己的特色，就不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 三、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问题

在探讨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问题时，学者们认为学科体系的规范化与本土化密切相联。有的学者介绍了地方院校办民族学系的特点和经验，作为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例证；有的学者对“人类学中国化”的所指及含蕴进行了四方面的概括。认为“中国化”首先假设了一个不变的中国场景来解释中国现实，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及变迁性。同样也假设了一个不变的单一的西方，忽视了西方话语内在的歧异性和对抗性。指出中国化并非认知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学科研究的身位化，与学界内部话语权力有关；有的学者通过对中越边境跨界民族京族地方社群的民族、国家意识变迁的个案研究，指出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范围是多元的，是很有弹性的，需要不同地域的学者群体在各自不同的空间体制内进行探讨。

#### 四、汉人社会研究的范式、进展和启示

有的学者通过比较香港农民和渔民祖先崇拜的差异性、天后信仰与妈祖信仰，指出地方宗教信仰传统与当地的生态和社会组织有关，我们在研究时应掌握认识地方知识的若干层面，包括认清符号背后的意义，避免把社会风俗标准化；有的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的关系，指出家族企业最大的困境在于家族文化的缺失，家族企业要想发展应该进行家族文化的重塑与超越，途径是儒学治家。有的学者用田野研究所发现的“同姓不同宗”现象，解构杜赞奇关于华北汉人社会研究中用姓氏结构来建构宗族制度的结论，指出学术研究应该走向田野；有的学者通过分析中国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的工分材料，证伪了俄国学者恰亚诺夫关于经济、劳动力和消费的假说，指出人们的劳动机会受文化表演背后的逻辑支配，同时消费自身并不仅仅是满足生理需要，还是文化上的表演，是人们通过消费向社会展示他的意义的一种象征，即消费的文化意义问题；有的学者从羌族的田野研究探讨华夏边缘的问题，从微观角度考察羌族地区有密切关系的人群的认同互动，指出在这种地区，“汉”与“非汉”是模糊的，类似于中国文献里表征的“生番”与“熟番”、“生苗”与“熟苗”等等概念。

#### 五、学科应用的领域及前景

有的学者回顾和总结了地方民族研究的应用和实践情况，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的实践、参与维护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的工作、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等；有的学者通过滇池流域居民行为方式对滇池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案例，指出人类学应用研究应做到致知必行；有的学者研究哈尼人的梯田与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提出对人类学田野的研究还需要整合生态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有的学者以萨满

治病为例，研究人类学视野中的信仰疗法，指出萨满治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迷信，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现代医学心理治疗的角度看是一种民间智慧，应列入文化遗产，从立法的角度予以保护；有的学者从对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反思指出，要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从口传文化自身来研究、发掘其与文学不同的文化内涵，把握其内部规律；有的学者通过青藏铁路沿线民族人口迁移情况的调查，对当地民族迁移和文化适应的若干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具体措施；有的学者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人类学家参与乡村社区毒品艾滋病控制，对四川省昭觉县竹核乡特定人群和社区的特点采取干预行动，以实际操作解决社会问题并参与变迁的全过程。得出结论认为：边缘社会同样具有内部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资源。个人和群体行为的改变必须建立在行为主体的主观努力之上，只有尊重当地人的主体性，发挥边缘人群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才可能消除群体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危机。任何不顾当地文化条件的强制灌输和单靠外力推动行为干预不可能有良好的效果。

## 六、学科中国经验与学科方法论反思

有的学者从全球化与人类学的关系入手，指出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和下层主义问题与现代社会群体认同多样性有关。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是各亚文化群体的构建。文化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它并非传统存在而是与社会进程有关，西方民族国家是十分依赖固化的族群与文化分类标准而存在的，并将此扩展到非洲等地。而所有这些分类与相关概念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前现代社会有界限清晰的民族文化而界限正在被全球化铲平。实际上前现代文化有很强的综合性的原生主义，所以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圈、文化模式只是展现社会文化特点供行动者加以选取而已。它们的清晰边界并不存在，更应该关注的是社会文化等概念的衔接与连续性；有的学

者根据在新疆做田野的切身体验指出，多元文化环境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学者对同一田野会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受过严格人类学训练的本文化研究者与异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合作会对跨文化研究产生多角度、多层面的解释，从而达到人类学“深描”的效果；有的学者从历史脉络中思考民族国家的权力关系，民族国家怎样由想象的共同体发展为现实的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元素之间的互动如何促成其产生，而对民族的想象和描写往往变动和差异极大，这些问题值得人类学民族学家加以反思；有的学者以多民族交汇边缘区的“藏彝走廊”为例，指出过去的研究忽略了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跨省而居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应加强区域视野即“面”的研究，并借助历史了解其形成轨迹；有的学者通过对长角苗个案的分析，指出全球化可以促进文化的自我确认，但也会带来负面的效果。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和民族诗学的出现，促使现代的人类学家反思自己在文本写作过程中自身社会文化背景和权力、利益关系，以尽量避免调查对象的失语，并对文本的可靠性保持清醒的认识；有的学者提出了国内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跨越式发展道路的若干问题。

## 七、少数民族文化及弱势群体权益保护

有的学者对使鹿鄂温克人历史上经历的文化过渡及今天面临的文化变迁进行梳理，提出挖掘其优秀传统文化和解决其所面临困境的思路，是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对弱势群体所面临文化冲突的关注；有的学者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许多小民族面临着既要生存和发展，又要保留自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局面，特别提出普通教育与少数民族语言流失之间的矛盾。对中国西北的穆斯林群体的发展，人类学家应以人类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他们比较特殊的民族群体和为常人不可理解的、被主流社会看作是特殊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进行科学合理的阐释；有的学者从女性人类学的角度展示了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情况，突出弱势群体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

# “海峡两岸民族学人类学机构 负责人联席会议”综述

王 晓 莉

2003年10月10日上午8~12时，“海峡两岸民族学人类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在中协宾馆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及台湾、香港的民族学人类学机构负责人30多人。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王彦全程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分三个专题：一、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及相互关系；二、关于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的学术准备问题；三、今后各民族学人类学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第一专题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教授主持，形成两点决议：

一、大多数代表同意将人类学争取为一级学科以扩大学科资源。为此会议建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牵头组织力量以具体操办申报工作；

二、加强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合作并在适当时候成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联合会。

第二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主持。会上，各地代表就各单位为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所作的准备交流了意见，一致认为为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学